

CIHUIXUE
LILUN YU
YINGYONG

词汇学 理论与应用

(五)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

(五)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编委会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2010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五)/《词汇学理论与应用》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ISBN 978-7-100-07085-0

I. ①词… II. ①词… III. ①汉语—词汇学—文集
IV. ①H13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494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CÍHUÌXUÉ LǏLÙN Yǔ YìNGYÒNG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

(五)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085-0

2010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2

定价: 30.00 元

目 录

词汇语义学的元理论——词汇语义学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

..... 张志毅 苏向丽(1)

论汉语的单音词..... 李如龙(9)

论新词语的短期消亡 王 宁(29)

汉语词汇类型近现代以来发展演变特点谈片 周 荐(36)

再论语词分立 温端政(58)

偏义复词形成和理解的功能与认知机制 ... 宋文辉 魏 丽(76)

百科新词的语义生成与义位描写 王东海 王丽英(88)

对现代汉语多义词地位的认识——基于《现代汉语词典》

和《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的多义词计量研究 张 莉(100)

从词义到词语模式：创造性类推构词中词语模式的

范畴扩展..... 朱 彦(115)

“严重”意义的原型研究——以“严重车祸(交通事故)”为例

..... 王吉辉(139)

“地位”和“地步”的词义演变及相互影响..... 匡鹏飞(157)

汉语成语语义转移的类型及其机制..... 谢仁友(171)

汉语语文辞书词性标注的几点思考..... 苏宝荣(181)

现代汉语同义单双音节词及其标记模式演变研究——以

《国语词典》(删节本)、《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为例 ... 白 云(197)

2 目 录

谈词典释义中的括注“区别于…”	叶 军(213)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儿化”探讨	余桂林(222)
论社区词的地位	田小琳(240)
香港书面汉语常见自造词语研究	
.....	石定栩 刘 艺 盛玉麒(255)
异形词与方言词源研究	陈立中(270)
现代汉语中的俄源外来词	魏慧萍 关洪侠(278)
语文教材词语的“摊饼式”分布态——兼谈基础教育	
基本词的提取方法	苏新春 顾江萍(291)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同义词及其他易混淆词的研究	
.....	刘晓颖 郭伏良(311)
汉语“语块单位”研究	郑定欧(319)
共现结构在校对软件中的应用研究	孙 毕(332)
语素化的基本路径及其相关问题	杨文全 彭 晓(345)
现代汉语单义词素的确定及其类型系统	孙银新(366)
联绵字定性探究	王伟丽 张志毅(376)
“以致”的词汇化考探	孙书杰(390)
《国语》首见复音词研究	陈长书(400)
试论殷墟甲骨刻辞义位类型	王晓鹏(419)
后记	 (432)

词汇语义学的元理论*

——词汇语义学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

鲁东大学 张志毅 中国传媒大学 苏向丽

元理论(metatheory),也叫元科学(metascience)或二阶科学,有时称之为研究科学(science studies),是关于理论的理论、科学的科学,是对科学、理论及其发展的反思,它是19世纪末产生的。目的是揭示、论证、完善并发展科学理论以及认识理论。近半个多世纪,语言研究已经从经验主义转到理性主义,理论要素更加突出。一个学科理论,应该从“应用论证”、“注解论证”转变为“前导思维”,从对“传统思想”的反思中提出前导的核心范畴、理念、思想,以引导研究实践。美国哲学家 M. W. Wartosky 认为“从科学是思维的一种理性体系的程度上说,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论”。理论是反映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包括概念、范畴、次范畴、判断、推理、原理、学说、假说、定理、公式、解说等。

理论,是科学动力的第一要素。我国某些学科的现状是,学科成果貌似丰收,而理论思想却几近荒芜。只有理论,才最能增加某一学科的知识总量。理论既然如此重要,这里要集中讨论一个问题:词汇语义学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主要来源于五个认知域。

*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辞书理论史研究”(项目编号:08BYY046)成果之一。

1. 来源于实践认知域。

这是传统观点的改良。实践或语料促使人们产生的是感性经验知识。它具有感性、外在、非本质等特点。只有超越这些,才能升华为科学理论。它起码应该具有下列6个特性:1)理性,2)本质的整体性,3)内在的逻辑性,4)多维的系统性,5)结构的和谐性(这是爱因斯坦强调的),6)多元论(奥地利籍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P. K. Feyerabend/费耶阿本德的主张),而不是一元论(Th. 库恩的观点)。可见,理论不会直接地、单纯地来源于实践。这中间的第一位思维抽象活动,就是范畴化(categorization)。例如古代的一些特称词,中古以后演化成短语:

驹→小马 骠→黑马 骥→好马 骐→青黑色的马
洗→洗脚 浴→洗澡 澡→洗手 沐→洗头

把这类现象上升为一个概念,升华为一个范畴,就是“语化”,也就是“非词化”、“反词化”或“词化程度(degree of lexicalization)”走低,在一些古旧词场中,由于多种原因,许多特称词必然由综合型表达法(synthetic expression)变成分析型表达法(analytic expression)。

严格说来,理论不是简单地来源于实践,而是来源于实践的范畴化及次范畴化。

G. Lakoff(1987:6)认为“对我们的思维、感知、行动和言语来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范畴划分更基本的了”。范畴是知网的网结,是认知的枢纽,是理论的支撑点阵。范畴体系,就是理论。

如何范畴化?主要有六种程序:

第一,经典范畴化,认识、分析、比较、归纳、划分事物的个性和共性特征(features)。这是 Aristoteles 以来惯用的方法。

第二,原型范畴化,发现同类成员的相似属性(attributes),寻找核心典型成员,更清楚认识它的具有代表性、具体性的属性。这是20世纪30年代Wittgenstein、70年代Rosch(罗什)以来兴起的方法。

第三,去个性,存共性,提取主要的具有区别性的特征或属性。

第四,用最简明的词语、公式、模型或定律表达上述特征或属性。

第五,借助多种思维方式完成范畴化。例如,借助逆推或类推思维方式,由同化而异化,由语法化而词汇化,由词化而语化,等等。

第六,范畴化切忌直觉、内省的简单枚举。“如果只有凭直觉得来的数据,科学也不会像今天这样进步。”“必须把不可靠的复杂知觉转化成可靠的简单直觉。”(D. A. 克鲁斯,1986)

可是,科学技术发展到当今的信息时代,许多学科的理论不完全来源于实践。词汇语义学的理论,除了实践认知域,还至少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

2. 继承。来源于古代认知域。

对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的认识,要摆脱只言片语,抓住观念、理念、思想。

关于意义的指称论,中国古代有墨子、公孙龙、荀子等多家高论。仅以《墨子·经说上》为例:“所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墨子间诂》卷十,《诸子集成》第4册第211页)其意为:用来作为称呼的,是名;所称呼的,是实(事物)。名、实成双,相互符合。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能指和所指”关系论。

对《说文解字》首先得抓住它的系统观。用六书特别是四书和

540 个部首(义类)认识并统帅 9 000 多汉字。许慎自叙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这一系统理念演绎出《说文解字》。它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著述中系统思想最突出的一本。有的学者满地散钱,可惜无绳串联;满纸零珠碎玉,可惜不成体系。

对《中原音韵》首先得抓住它的创新精神。它突破《广韵》正统,依据戏曲开创新音系:平分阴阳,入派三声,韵分十九,调分阴阳上去。一反文献音韵、正统音韵,开创戏曲音韵,使韵书第一次接近口语。跟其他科学一样,语言学特别是词汇语义学的创新,就得有反传统的精神。

3. 借鉴。来源于外国认知域。

有两种类型的借鉴:一是基础,指精读语言学 and 词汇语义学经典著作,如 Saussure、Bloomfield、Chomsky、Hockett、Звегинцев、Виноградов、Смирницкий、Апресян、Leech、Lyons、Cruse 等人的论著。二是专题,指围绕自己的专题,研究相关的学术思想史和前沿成果。如研究色彩或附属意义,必须读张会森的《关于 Connotation(Коннотция)及其研究》和汪榕培的《关于语言的 Connotation》,分别发表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外语与外语教学》1994 年第 3 期和 1997 年第 4 期上,从中借鉴 Bloomfield、Hjelmslev 等许多学者的理论(附属意义观念的沿革、性质、形态、类型),以使我们的研究从山峰上兴起,而不是在平原上蹦跹。这就是古人常说的,方寸之草,高于山峰。借鉴外国成果的捷径就是首先关注中国外语院校办的刊物以及翻译著作,其次才是外语原文论著。

即使名家,也需要借鉴。例如现代语言学鼻祖 F. de Saussure 从俄国 Kazan School(喀山学派)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博士生

H. B. 可鲁舍夫斯基的博士学位论文《语言科学概要》(1883)借鉴了两种理论:一为语言是符号系统,二为两种联系——词的类比性联系和邻接性联系, Saussure 把它们叫作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也就是至今常叫的聚合和组合。中国现代语言学领路人之一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词是怎样变了意义的”、“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两节就是借鉴了 J. Vendryes(房德里耶斯)的《语言论》第三编第二、三章。

4. 移植。来源于相关学科认知域。

合精法,哥白尼说:“要善于集合相近学科的理论精华。”相关学科是有内在联系的,互相渗透的。因此应该注意从语言学外部和内部移植有活力的范畴、理论,以便推进本学科的带一定创造性的研究。

(1) 移植自语言学外部。

经济学概念“价值”,在 1916 年以前,索绪尔把它移植到语言学。开创了语言单位价值意义即系统意义(后来 Lyons 把它叫作内指意义)研究的新领域。

数学概念“模糊”,在 1965 年由美国的 L. Zadeh(札德)教授提出,1972 年 G. Lakoff(雷科夫)成功地引进词汇研究。

数学概念“生成/generate”,在 1957 年被美国的 Chomsky 引进语言学,创建了生成语法,指用有限的规则可以界定、描写、生成无限的句子。

数学概念“离散的和非离散的”(discrete, non-discrete)移植到语音学,指相对明确边界的语音单位,最小的离散单位是音子,常见的离散单位是音位、语素、词。移植到词汇学,产生了词的离散性这一范畴。移植到语法(美国语言学家 J. R. Ross/约翰·罗伯

特·罗斯于20世纪70年代初),产生了非离散语法,指合乎语法性(合格性和不合格性)、规则适用性(可接受性和不可接受性)、类属关系等不存在截然不同的分界线,都是程度问题。

物理学概念电磁场,1832年由英国 M. Faraday(法拉第)提出,1924年、1931年先后由 G. Ipsen(伊普生)、J. Trier(特里尔)引入语言学,创造了概念场、词汇场、语义场。

化学概念化合价(原子价)/配价,20世纪50年代初被法国语言学家 L. Tesnière(特斯尼耶尔 1954 年去世,见于其 1959 年的遗作)引进语言学、语法学,后来也用于语义学。一说,他提出“依存语法”,后人从中类推、细化出“配价语法”。

系统科学概念“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系统在没有任何外部指令或外力干预的情况下自发地形成一定结构和功能的过程和现象。”《哲学大辞典》)被徐通锵(1997:83)引入语言学。

音乐学概念“基音(乐音中的最主要成分)、陪音(乐音的次要成分)、音域(发音体发出乐音的高低音范围)”被词汇语义学仿造成为“基义(义位中的主要成分)、陪义(义位中的次要成分)、义域(义位的范围)”。

(2) 移植自语言学内部。

从语音学移植到词汇语义学的范畴,移植中有模仿、改造:

“语音对立特征的中和”这一范畴移植到词汇语义学,创造出“语义对立特征的中和”。

“语音组合的强位、弱位”这一对范畴移植到词汇语义学,创造出“语义组合的强位、弱位”。

“语流音变”这一范畴移植到词汇语义学,创造出“语流义变”。

“共时音变、历时音变”这一对范畴移植到词汇语义学,创造出

“共时义变、历时义变”。

音位这一范畴移植到词汇语义学,创造出“词位、义位”。

音素这一范畴移植到词汇语义学,创造出“词素、义素”。

音位变体这一范畴移植到词汇语义学,创造出“词位变体、义位变体”。

超音位这一范畴移植到词汇语义学,创造出“超词位”(指语义场中的总称词)。

位、素理论,又被移植到文学,创造出“文位”、“文素”、“文位变体”。用语义学的一些范畴、理论分析文学,出现了“语义文学”,出现了一个研究文学的新路子叫“花园路径”。

5. 升华。来源于理性认知域。

继承、借鉴、移植都是已有的理论及其应用,而新理论的产生,除了一些是实践或语料的归纳、总结之外,还有一些不是来源于实践或语料,而是来源于理性认知域,来源于 logos,来源于思维的自由创造,我们称之为升华。这就是 A. Einstein 对自己巅峰科研活动的独到的总结:“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而不是从经验中直接概括的。”至于对科学有重大突破作用的假说,更是想象、推测、推理的结果。

一个国家强盛,先强在新理论上。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国”;“民主政治”思想使法兰西成为欧陆强国;“门罗主义”使美利坚成为世界强国。同样,一个学科、一个学派、一个学者、一个论著的超乎寻常,首先也在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徐通锵 1997 《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8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五)

张志毅 2004 《“第四王国”呼唤新世纪的索绪尔》,《中国外语》第2期。

张志毅、张庆云 2005 《词汇语义学》,商务印书馆。

郑文婧、张志毅 2005 《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科技术语研究》第1期。

D. A. 克鲁斯 1986 《词汇语义学》(部分章节译文见汪榕培等《八十年代国外语言学的新天地》),剑桥大学出版社。

G. Lakoff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论汉语的单音词

厦门大学 李如龙

一 上古汉语单音词占优势

汉语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已经发现的甲骨文虽有 4000 多字,因受到占卜应用的限制,反映社会生活的词语有限。要从中了解早期汉语的全貌是有困难的。甲骨卜辞中有没有复音词,曾有过一些争议。除去人、地专名不论,“御史、大史、小史、上下、往来”等常见组合怕是很难说一定是词组。向熹曾做过概括的叙述:“甲骨刻辞所反映的商代词汇特点是内容相当广泛,但是数量有限,绝大多数是单音词,复音词很少;多数只有一个意义,……就词性说,名词最多,动词次之,形容词较少,虚词更少些。兼类现象相当多”。(向熹,1993:365)甲骨文少量的双音名词只能看成复音词的萌芽。

就先秦的传世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统计之后,伍宗文认为,西周时期“复音词的主要类型已经大体具备”(伍宗文,2001:328)“到了春秋战国进入了第一高潮期”。他曾列了几部主要典籍的复音词所占比例(所统计的复音词已扣除方言):

书名	总词数	单音词	复音词	复音词所占比例
诗经	3 450	2 476	974	28.2
论语	1 479	1 150	329	22.2
孟子	2 240	1 589	651	29
左传	4 177	2 992	1 185	28.3
吕氏春秋	3 992	2 844	1 148	28.7

先秦文献的双音词有许多学者做过统计研究,据我们所做的比较,虽然具体数字有些出入,总的说来,以上统计数字大体是可信的。

先秦的复音词虽然只占 $\frac{1}{4}$ 左右,就其造词方式和构词方式说,已经覆盖了后来的复音词的生成方式的大部分。主要构造方式是:

叠音:关关、彬彬、巍巍、明明、滔滔

双声:伊威、参差、果敢、辗转、邂逅

叠韵:逍遥、凤凰、螟蛉、名声、禄爵

联合:人民、朋友、计算、衣服、争斗

修饰:大夫、小人、百姓、五谷、先生

其余构词法也开始露头了,例如:为人、立夏、牵牛、执事(支配)、走出、饿殍、战胜、防止(补充)、自爱、冬至、自杀、日蚀(陈述)、有殷、於越、于归、涟如、恢恢然、婢子、眸子、婴儿子(附加)等。

有些双音合成字的字序尚未稳定,例如:美好—好美、长久—久长、威严—严威、粟米—米粟、甲兵—兵甲、学问—问学、服从—从服、计算—算计、还归—归还,等等。

伍宗文还指出一个重要事实：上古汉语的单音词不但数量占优势，而且使用频率比复音词高得多。他做过一个比较：

书名	单音词	使用次数	平均	复音词	使用次数	平均
论语	1 079	12 690	11.8	329	838	2.5
吕氏春秋	2 704	81 400	30.1	1 148	4 165	3.6

据此，他认为：“单音词在上古汉语显占优势”（伍宗文，2001：372），这一结论是符合先秦汉语实际的。

先秦的数百年间，中华民族已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不论是《诗经》、《楚辞》，还是诸子政论和散文，至今还闪烁着夺目的光辉。这些文化和典籍就靠着数千个汉字所标示的单音词，何以就能够表达出如此丰富多样的内容呢？关于这一点，也许可以做几点解释。

第一，上古汉语的音节有较大的容量。关于上古音系，目前尚无明确定论，但各家说法也相去不远，声母大约有 28—32 个，韵部在 28—29 部之间，每一个韵部之中还有开合，也许还分等，至于声调，许多学者都认为和中古音一样有平、上、去、入四声（《诗经》多按四声分别押韵就是最大论据）。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上古音有复合辅音。上古汉语声、韵、调组合的音节数可能在 2 000 个以上。

第二，同样的音节可以有不同的汉字用来区别同音异义的单音词。例如：来、徠、莱（来母之部、平声），会、侔、脍（见母月部、去声），专、颛、𩇛（章母之部、平声），阻、俎（庄母鱼部、上声）。有的字可以用不同韵母（阴阳对转）或声调变化（四声别义）来区别不同的词义，例如：能，奴来切，又奴登切（之蒸对转）；喁，鱼容切，又元惧切（侯东对转）；贲音奔，又音肥（微元对转）。好、饮（上、去两读），

听、看(平、去两读),沈(平、上两读),则是一直传到现在的别义异读的单音词。

第三,不少同形、同音的单音词有不同的意义和用法,是多义词,有的不同义项之间还有较大的跨度。例如:

疾:病(《论语》:曾子有疾),痛恨(《孟子》: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快速(《庄子》:不徐不疾)。

固:坚固(《论语》:今夫传颡臾,固而近于费),坚决(《战国策》:孟尝君固辞不往也),本来(《孟子》:臣固知王的不忍也)。

又如“子”,可指儿子,可指女儿,可作男子美称(先生)。可表爵位,也作为地支名。

第四,自从汉藏语比较研究广泛开展以来,中外的许多名家对上古音进行了许多深入的、有成效的探讨。有几个要点已经为许多专家普遍认同:汉语和藏语是根据最充分的有同源关系的亲属语言;一千年前创制的古藏文是拼音文字,所记录的古藏语是准确的,且与现代藏语有明确对应关系,所标记的音和古藏文以及上古汉语的语音也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藏文有丰富的形态变化,有b-、d-、g-等塞音前缀,l-、r-等流音前缀和啞音、鼻音前缀,有塞音带l、j、r、w的复合辅音,有-b-、d-、g-、m-、ŋ-、n-、l-、r-、s等辅音韵尾,但没有声调。在这方面,潘悟云在他的《汉语历史音韵学》(2000)中曾介绍过数十年来中外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也表明了他的观点。诸如:上古音是从无声调到有声调的蜕变期,去声字是从早期-s尾变来的,上声字曾有紧喉音,声母有不少复合辅音,还有一些形态变化的遗迹等。这也可以说明,上古时期有着数千个汉字所标记的常用单音词,确实是可以富有表现力的。而且可能正是表义的汉字抑制了用形态手段派生多音词的造词方式,使汉语定